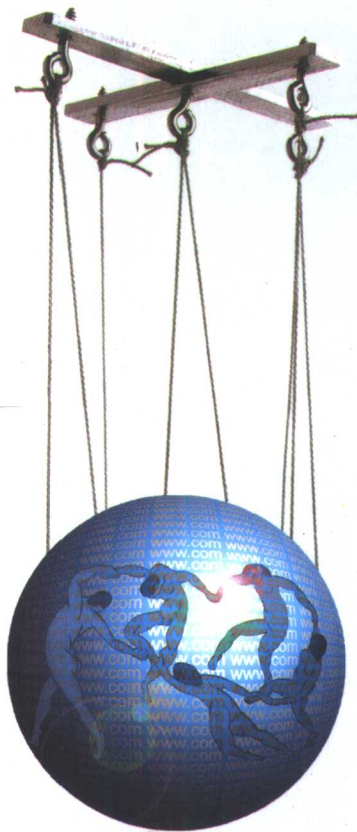


现代性之隐忧

The Malaise of Modernity

[加]查尔斯·泰勒 Charles Taylor / 著

程 炼 / 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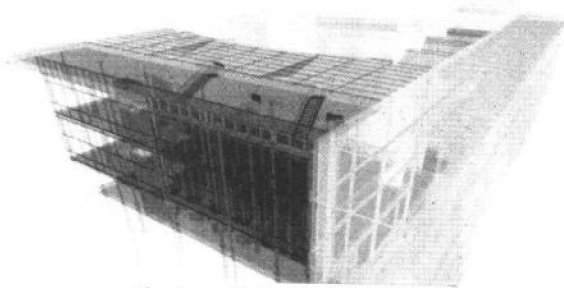
现代性之隐忧

The Malaise of Modernity

B0
39

[美]查尔斯·泰勒 Charles Taylor / 著

程 炼 / 译



北方工业大学图书馆



00492133

中央编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性之隐忧/(加)泰勒(Taylor, C.)著;程炼译.

-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1

ISBN 7-80109-428-X

I. 现…

II. ①泰… ②程…

III. 社会学-研究

IV. B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81055 号

现代性之隐忧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100032)

电 话 66117130、66521152(编辑部) 66171396(发行部)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E-mail cctp-edit @ sina.com

印 刷 北京金瀑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字 数 72 千字

印 张 5.25

版 次 2001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7000 册

定 价 10.00 元

给碧西娅(Bisia)

我感谢康尼 (Connie) 和弗兰克·摩尔 (Frank Moore) 在讨论这项计划时给予的帮助, 感谢露丝·艾贝 (Ruth Abbey) 和婉达·泰勒 (Wanda Taylor) 仔细地阅读了我的手稿。我感激尤塞比亚·达·席尔瓦 (Eusebia da Silva) 在确定本书和本书归属的更大计划时给予的帮助。

目 录

一 三个隐忧	1
二 含糊不清的争论	15
三 真实性之源	29
四 不可逃避的视野	35
五 对认同的需求	49
六 滑向相对主义	62
七 继续战斗	81

八 更微妙的语言	93
九 一个铁笼?	107
十 反对分裂	126
注 释	141
译名对照表	154
译者后记	163



一 三个隐忧

我在这里想就现代性的某些隐忧展开叙述。我指的是我们当代文化和社会的特点，尽管我们的文明在“发展”，人们仍视这些特点为一种失败或衰落。有时人们觉得，严重的衰落发生在刚过去的岁月或年代里——例如，自第二次世界大战或 50 年代以降。有时候，人们从更为长远的历史区段里感受到这种衰落：从 17 世纪至今的整个现代屡屡被视为是处在衰落的时间框架里。即使时间跨度变化很大，衰落的主题仍有某些重合。这些主题总是围绕几个主旋律发生变奏。这里我想挑拣出两个此类核心主题，然后添上第三个大可从前两个推导出

的主题。这三个主题决没有穷尽我们的话题，但它们确实触及到使我们对现代社会感到困扰和迷惑的大部分问题。

我将要谈论的忧虑是耳熟能详的。不必向任何人提醒这些忧虑；它们一直在各种媒体中被讨论、被惋惜、被挑战、被辩驳。这似乎是用不着进一步谈论它们的一个理由。但是，我相信熟悉掩盖了混乱，我相信我们并未真正理解使我们忧虑的那些变化，我相信通常对它们进行的争论事实上错误地表达了它们——因此使我们错误地相信我们能对它们做些什么。给予现代性明确含义的那些变化既是众所周知的，也是非常复杂的，这就是为什么它们值得更多地加以讨论的原因。

(1) 忧虑的第一个来源是个人主义。当然，个人主义也被许多人冠以现代文明的最高成就之名。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人们有权利为自己选择各自的生活方式，有权利以良知决定各自接受哪些信仰，有权利以他们的先辈不可能驾驭的一整套方式确定他们生活的形态。这些权利普遍地由我们的法律体系保卫着。原则上，人们不再受到超越他们之上的所谓神圣秩



序要求的侵害。

没有什么人想要背叛这项成就。实际上，许多人认为它仍是不完全的，认为经济安排、家庭生活模式或传统的等级观念仍过多限制着我们实现自我的自由。但是我们中的许多人也是暧昧的。我们从较古老的道德视野中挣脱出来才赢得现代自由。人们过去常常把自己看成一个较大秩序的一部分。在某种情况下，这是一个宇宙秩序，一个“伟大的存在之链”，人类在自己的位置上与天使、天体和我们的世人同侪共舞。宇宙中的这种等级秩序曾反映在人类社会的等级结构中。人们过去总是被铜锁在给定的地方，一个正好属于他们的、几乎无法想像可以偏离的角色和处所。借助于怀疑这些秩序，现代自由得以产生。

但是，这些秩序在限制我们的同时，也赋予世界和社会生活的行为以意义。我们周围的事物不仅仅是我们计划的潜在原材料或工具，这些事物在存在之链中的地位本身也是有意义的。鹰不再只是一只鸟，它也是整个动物生活领域之王。同样，社会的礼仪和规范并不限于工具性的意义。对这些秩序的怀疑被称为世

界的“去幻”(disenchantment)。有了去幻,事物就失去了自己的一些幻象。

关于这是否是一件不容置疑的好事,激烈的争论已经持续了几个世纪。但这不是我在此想要关注的事情。我想考察的是人们认为什么对于人类生活和意义是最为重要的。

人们反复表达的一个忧虑是,个人除了失去了其行为中的更大社会和宇宙视野外,还失去了某种重要的东西。有人把这表述为生命的英雄维度的失落。人们不再有更高的目标感,不再感觉到有某种值得以死相趋的东西。在上个世纪,亚列克西斯·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有时也这样说,人们在民主的时代往往寻求一种“渺小和粗鄙的快乐”^[1]。换句话说讲,我们受害于激情之缺乏。克尔恺郭尔(Kierkegaard)借此看到“现时代”(the present age)。尼采的“最后的人”处于这种衰落的最低点;他们的生命中不再留有任何抱负,只有“可怜的舒适”^[2]。

目标的丧失是与一种狭隘化相联系的。人们因为只顾他们的个人生活而失去了更为宽阔的视野。托克维尔说,民主的平等把个人拽

向自身，“导致个人将自己完全封闭在内心的孤独之中的危险”^[3]。换句话讲，个人主义的黑暗面是以自我为中心，这使我们的生活既平庸又狭窄，使我们的生活更缺乏意义，更缺少对他人及社会的关心。

这个忧虑近来再度浮现在对“放任社会”的苦果、“我这一代”的作为、“孤赏自恋”的流行的关切中，这里只列举了这三个人所共知的当代表述。生活被平庸化和狭隘化，与之相联的是变态的和可悲的自我专注，所有这些感受已经以当代文化所独有的形式回潮了。以上勾勒了我想讨论的第一个主题。

(2) 世界的去幻与现时代的另一个极其重要的现象相联系，这个现象也极大地困扰着许多人，我们可以称之为工具主义理性的主导性。我的“工具主义理性”(instrumental reason)指的是一种我们在计算最经济地将手段应用于目的时所凭靠的合理性。最大的效益、最佳的支出收获比率，是工具主义理性成功的度量尺度。

毋庸置疑，将旧秩序扫荡一空已经极大地拓宽了工具主义理性的范围。一旦社会不再有

一个神圣结构，一旦社会安排和行为模式不再立足于事物的秩序或上帝的意志，这些社会安排和行为模式在某种意义上就可以嬗变由人。我们可以重新设计它们，我们的目的是让它们产生个人的福祉安康。因此管用的尺度就是工具主义理性的尺度。与之相似，一旦我们周围的创造物失去了它们在存在之链中获得地位的意义，它们就容易被当作我们计划的原材料或工具。

一方面，这种变化是解放。但也带来一种广泛的不安：工具主义理性不仅已经扩展了它的范围，而且也有控制我们的生活的威胁。令人害怕的是，应该由其他标准来确定的事情，却要按照效益或“代价—利益”分析来决定；应该规导我们生活的那些独立目的，却要被产出最大化的要求所遮蔽。人们可以指出许许多多实实在在体现这种忧虑的事情：例如，经济增长的要求用来为非常不平等的财富和收入分配辩护，同样的要求使得我们对环境的需要，甚至对潜在的灾难无动于衷。或者，我们能够想想我们社会规划的运作方式，在像风险评估这类关键领域，大多也是被种种形式的代价—



利益分析所左右，这类分析涉及一些荒诞不经的计算，用美元估算人命。^{〔4〕}

工具主义理性的主导性在技术周围的名望和影响也是明显的，它使我们相信，我们应该寻求技术上的解决，哪怕我们需要的是非常不同的东西。像贝拉（Bellah）和他的同事们在他们的新书中有力地论证的那样^{〔5〕}，我们在政治领域里足够多地看到这一点。但是，工具主义理性的主导性也侵入到其他领域，像医学领域。帕特里莎·本纳（Patricia Benner）在一系列重要的著作中已经论证，医学中的技术方法经常将一种护理撂在一边，这种护理把病人看成是一个具有生活经历的完整的人，而不是把病人看成是一个解决技术问题的场所。社会和医疗设置常常小瞧了护士的贡献，但比起那些有高技术知识的专家，护士们反而能提供这种有人情味的护理。^{〔6〕}

技术的支配地位也被认为助长了我们生活的狭隘化和平庸化，我已经讨论过这种与第一个主题相关联的狭隘化和平庸化。人们曾经论述过我们人类环境曾有的共鸣性、深刻性或丰富性的丧失。大约 150 年前，马克思在《共产

党宣言》中写道，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之一就是“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该断言是指，过去服务于我们的那些可靠的、持久的、总是意味深长的东西，正在让位给那些堆积在我们周围的快捷的、廉价的、可替换的商品。阿尔伯特·伯格曼（Albert Borgman）谈到“装置范式”（device paradigm），由此我们从与环境的“多方交往”中一步步后退，并代之以索求和获得可带来一些预期好处的产品。他将两种取暖方式作了比较，即今天我们用中央取暖炉温暖我们的房子，而在拓荒时代，温暖房子意味着整个家庭都要参与砍伐堆放柴木和添薪加火这些事务。^{〔7〕}汉娜·阿伦特（Hanna Arendt）则注意到当代用品越来越短命的特点，她论证道，“人类世界的实在性和可靠性基本上倚赖于这样一个事实：我们被事物包围着，而这些事物比生产这些事物的行为更为恒久。”^{〔8〕}这种恒久在现代商品世界里正面临威胁。

工具主义理性的主导性不只是一个或许无意识的方向（现时代刺激和引诱我们趋于这个方向），认识到这一点增加了上述威胁感。就此而论，与现时代抗争是非常困难的，但至少



可以去说服它。然而很清楚，社会生活的强有力的机制正沿着这个方向压迫着我们。一个经理，尽管有自己的取向，也可能被市场条件逼着采纳一种他感到是破坏性最大的策略。一个官僚，尽管有个人的见解，也可能被他工作时依据的规则逼着去作出一项他明知违反人性和善意的决定。

马克思和韦伯（Weber）以及其他伟大的理论家已经探索了这些无人情味的机制，韦伯用一个形象性的词语称之为“铁笼”。有些人想从这些分析中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我们在面对这些逼迫时是完全无能为力的，或者至少是无能为力的，除非我们完全拆除我们在过去几个世纪里一直活动于其下的制度性结构——即市场和国家。然而，这个抱负今天看起来实在无法实现，以致等于宣告我们的无能为力。

下面我将再次论述这个问题，但我相信这些有力的宿命理论是抽象的和错误的。我们的自由度不是零。思考一下我们的目的应该是什么、工具主义理性是否应该在我们的生活里起小一点的作用，这是有益的。但是，这些分析中包含的真理是，它不仅仅是改变个人的看法，

它不仅仅是“心灵和精神”的战斗，尽管这些都重要。这个领域中的变化必须也是制度上的，尽管它不可能像伟大的革命理论家们主张的那样广泛和彻底。

(3) 这把我们带到政治的层面，带到个人主义和工具主义理性的政治生活的令人恐惧的后果上。我已经介绍了一个后果，即工业—技术社会的制度和结构严重地限制了我们的选择，它们迫使社会以及个人重视我们在严肃的道德思考中从未重视的，甚至可能具有高度摧毁性的工具主义理性。相关的例子是，我们在处理像臭氧层变薄这样对我们的生活造成致命威胁的环境灾难时，碰到了巨大困难。可以认为，围绕工具主义理性建造的社会既给个人的也给群体的自由带来极大损失——因为我们的社会决策不仅仅是由这些力量形成的。一种与工具主义理性格格不入的个人生活方式是难以维持的。例如，某些现代城市的通盘设计使得人们离不开小汽车，特别是在削弱了公共交通而利于私人汽车的地方。

但是，还有另一种自由的丧失也被广泛地讨论，最难忘的是亚列克西斯·德·托克维尔



的讨论。在一个社会里，如果人民最终成为那种“封闭在自己的心中”的个人，那么几乎没有人愿意主动地参与自我管理（self-government）。他们将宁愿留在家里享受私人生活的满足，只要当时的政府生产这些满足的手段和广泛地分配这些手段。

这就为一种新的、形式特别现代的专制主义的危险敞开了大门，托克维尔称这种专制主义为“温和的”专制主义。它不是旧时代那种恐怖和压迫的暴政。政府是温和的和家长式的。它甚至可以保持民主的形式，有定期的选举。但事实上，一切都要靠一个“巨大的监护权力”^[9]来驱动，而人们将无法控制该权力。托克维尔认为，对此惟一的防御物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政治文化，在这种文化里，人们既看重参与各级政府，也看重参与志愿团体。但是，自我关注的个人利益至上主义对这种文化产生了不利影响。一旦参与行为衰减了，一旦曾作为媒介的横向联合团体萎缩了，个体公民就会独自面对巨大的官僚国家，正确地讲，就会感到无能为力。这使得公民变得更加消极，并形成了温和专制主义的恶性循环。